

日本对东北畜牛资源掠夺刍议

——以满铁调查资料为考察中心

马 伟^{1,2} 衣保中³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佳木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3.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东北畜牛资源丰富,久为日人所觊觎。1920年前东北有畜牛230—290万头。1920年代,其数量有所降低。伪满时期,东北牛肉大量供应日本军队及其官僚系统,尤其是日本海军和关东军,畜牛储量较前又大幅下跌。其持续走低的原因是日人规模性的屠宰、消耗及输出。同时,由于耕牛的不足,农耕大受影响。这种现象在日本投降后依然严峻。

【关键词】东北;畜牛资源;牛肉输出;掠夺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3-0073-09

On Japanese Imperialism Grabbed Cattle Resources in the Northeast China

——Taking SMR Survey Data as the Main Object

MA Wei^{1,2} YI Bao-zhong³

(1.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Marxism College,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154007; 3.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Cattle resources is rich in the Northeast, long coveted by the Japanese. The number of cattle reached from 2.3 millions to 2.9 millions in 1920 years ago. The number has decreased in 1920s. In the Manchukuo period, plenty of beef supplied Japanese army and its bureaucracy, especially the Japanese Navy and Kwantung Army, and so, cattle reserves fell sharply than before. The reason for its continued decline was the scale of butchered, consumed and outpu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shortage of cattle and farming was also greatly affected. This phenomenon was still hard after the surrender of Japan.

Keywords: the Northeast; cattle resources; beef export; grabbed

畜牛在东北畜产资源中占有重要一席,尤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而言,东北牛肉更是被作为“战略畜产资源”,制作成军用食品,供应日本军队,尤其是海军和关东军。牛肉是日本军队在海外行动的主要后勤保障。与钢铁、煤、石油等“战略决策性资源”相较,牛肉等畜产资源则具有战略保障性。关于畜牛资源的战略意义,取决于应用对象的不同。应用对象若为普通公众,属一般畜产;若应用于军事,则

[收稿日期] 2017-04-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吉林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中若干重大侵华罪行研究”(14JDW006)

[作者简介] 马伟(1976—),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生,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北农业史;衣保中(1962—),男,理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区域经济史研究。

具有战略意义。两者的关系上,如军事消耗无限制增加,势必抑制普通消费,其军事战略意义将凸显无疑。本文首先考辨近代东北畜牛资源数量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其次,探讨日人以东北牛肉规模性地供应其军队及官僚系统,尤其是日本海军,这种掠夺式的屠宰和消耗抑制了东北畜牛的自然增殖,直到战后东北牛荒依然严峻,并直接影响农业耕作。

一、东北畜牛数量辨析

要讨论日本对东北畜牛资源的掠取,首先须明确其数量,否则就是“雾里看花”。但客观地说,要得出可靠的畜牛数量是不易的。民国时期实业部、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等曾进行畜产统计,但近代中国乡村,交通不便,农民多目不识丁,而草原则彼此距离遥远,即使粗放式的调查也略显困难。号称拥有最完善调查机构的满铁,也很难确保其数据是可靠的。故要厘清日本对东北畜牛的掠取脉络,首先须在零星的资料间建立关联性,进而得出畜产数量的合理区间。

1920年前记载东北畜产的数据较为稀缺,且残缺不全。日本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编纂《支那经济全书》(共12辑),其中第9辑第1编涉及牧畜,但多侧重畜牧技术、畜产品市场、交易及进出口状况,对畜产数量并未关注,至多提及蒙古官有牧场和民有牧场的种群数量,东三省牛马市场和交易^①。《满蒙全书》载,1911年奉天畜牛42.8万头,黑省牛16.48万头。同时,还记录了一些府县的畜产数量^②。需说明的是,该书是文献编纂,而非实地调查报告,因此,所使用资料多系转载或毛估,且汇总之数据多为局部性。1914年《农商公报》载,东省牛98.3万头^③。但对东部内蒙古牛的数量却未有记录,此可作辅助性支撑材料。

1912年,我国农商部总务厅开始发行《农商统计表》,其中1914—1922年公布的数据中涉及畜产数量。从数据来源上说,它们由各地的村官采集,然后逐级上报,最后由农商部统一汇总。毋庸置疑,民国统计多模仿日本,但二者质量不可同日而语^④。1915年,东部内蒙古畜牛11.6万头。1916年该地牛达到140万头^⑤。仅一年时间,畜牛增长12倍。合理的解释是,日人东部内蒙古所含区域或许大于《农商统计表》所统计区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组数据的可靠性均存疑。1919年,畜牛20.2万头,但该年度,仅呼伦贝尔一地畜牛已达40万头。为此,南京农业大学李群教授以《农商统计表》和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为基础,提出 $P_n = (1+R)nP_o$ 的计算公式。R表示年增长率,P_n表示期末数,P_o表示期初数,n为年数。该计算模式或校正公式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牲畜年生产率,二是期初数^⑥。其中期初数是文献记载,或调查结果,是变量中的定值,而牲畜年生产率变数较大,直接关系到校正或推算结果。

一般情况下成年牲畜农区公母各半,牧区母畜60—70%,母畜受胎率70%—80%,成活率也是70%—80%,如不计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因素,每年自然淘汰率5%—10%。牲畜的增殖率=出生率-(出售率+死亡率+屠宰率)。还振举以日人《伪满时期兴安北省牧业调查》数据为基础,1938年伪兴安北省即呼伦贝尔牧区牛总数29455头,出生数7133头,损失数中卖掉1682头、死亡1021头、屠宰1096头,剩

① 东亚同文会编印:《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1922年10月再版,第16—19页。另可参见陈锋:《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满铁调查课编:《满蒙全书》第3卷,大连满蒙文化协会,1922年,第641页。

③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编:《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④ 关权:《20世纪10年代中国的工业生产:对〈农商统计表〉的评价与估计》,《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期。

⑤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满洲肉类加工业》,《满铁调查资料》第41编,日清印刷所,1924年9月,第10—11页。

⑥ 李群:《中国近代畜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91—92页。

余 3334 头。进而以实数推算出牛出生率 24.2%，外卖、屠宰、死亡 12.9%，生产率 11.3%^①。

满铁总局伊东靖诚依据“东蒙产业调查书”“满蒙全书”提供的数据^②，提出畜产算法，以前一年畜产数量为基础，牧区公母各半，牛受孕率 60%，牛一年一产或三年两产。上年度牛头数 $\times 1/2 \times 60/100 \times 2/3 =$ 纯生产数量，得出一般年份牛出产率 21%，屠宰、病死、冻亡等减耗率 16%，即牛可能的增殖率 5%^③。

客观地说，推估畜产数据难度较大，两组数据存在差异不足为奇。东部内蒙古牧区地广人稀，牲畜流动性大，实地踏查难度较大，调查人员遂采用蒙古包或畜群的形式计算畜产数。察哈尔一个蒙古包平均牛 6.6 头、马 4 匹、羊 26.4 只，骆驼 0.91 峰，一公里内平均 0.8 个蒙古包，从而计算出该旗的畜产数量。另，按畜群计算头数，一个放牧群或放牧组合平均牛 33.9 头，马 64.9 匹、羊 200.7 只，骆驼 19.8 峰，然后以群数或组合数得出调查对象的畜产数量^④。在局部踏查基础上，获取调查对象的平均数值。满铁总局及调查课、公主岭农事试验场结合实地踏查进行推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还振举仅依靠已有的实数进行推算，略显单薄。且损耗率仅在 13% 以内，也不大合理。东北气候严寒，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加之匪贼的劫掠，牲畜损耗较关内各省高是不争的事实。1912 年，达尔罕旗牛 7.5 万头，七八年间减少了 6 万头，1919 年仅为 1.5 万头。再，由于缺乏近代化的种畜繁殖能力和条件，牧区近亲繁殖严重，母畜往往很难如人所愿的生产，因此，畜牛年出生率 20% 左右，损耗率 12%–16%，年生产率 4%–8%，特别是 1920 年代及伪满时期，日俄超规模屠宰，畜牛年生产率甚至在 5% 以内也是可能的。

结合以上分析，1920 年前东北畜牛数 98–150 万头，东部内蒙古牛 140 万头，整个东北畜牛数量合理的区间是 230–290 万头，与李群教授的校正 1915 年牛 250.1 万头可相互印证。

1920 年代，仅有某区域或个别年份的数据可资利用，系统性的统计不多见。如 1922 年呼伦贝尔畜牛 17 万头^⑤。《满蒙现状》载，1924 年东北畜牛 200 万头^⑥。1929 年，东部内蒙畜产总数 264.1 万头。但并不意味着该时段畜产数量就无法把握。总体上看，此时期东北畜牛数量处于下降态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屠宰量急剧上升，而养殖方式未有改善。俄（苏联）人牛肉消费一直较高，在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齐齐哈尔、宽城子等地遍设屠宰场，年屠宰量 6 万头以上。其次，日人饮食加速西化，牛肉摄入量增加，牲畜屠宰业在东北迅速发展，此时期日本在奉吉两省直接及间接设置屠宰场达 41 处，年屠宰量超过 7–9 万头。此直接影响畜牛总量的增长。

① 还振举：《中国的内蒙牧区》，永祥印书馆，1952 年，第 40–41 页。

② 当然，对满铁殖民式的调查，也不可过分迷信，其资料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关于华北方面的调查资料，马若孟（Ramon H. Mayers, 1969）、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 1986）、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1988）等都认为，由于农户对殖民者怀有疑虑或畏惧，不愿主动提供信息，或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民国东北税制混乱，各种杂税摊派严重，农户交税压力较大，故也不愿告知实情。伪满时期，农户赋税压力有增无减。其税制包括税、租、捐、特捐、费等，征税有国税、县税和公课。1934 年满铁经济调查会对吉林永吉县南荒地农村进行赋税调查，其结论是，自耕农税费负担最重，国税、县税及公课合计占现金收入的 52.25%，其次是经营地主兼佃租农 36.1%，佃租户是 33.1%，（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农民的租税负担》，满洲日报社印刷所 1934 年 11 月，第 7–8, 15–16 页。）加上实物收入，该比率可能略低。故一旦进行调查，农户以为是交税前兆，多有抵触，其资料的可靠性也存在。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资料，1980 年代，杜赞奇曾访问满铁调查员旗田巍和小沼正，他们提出的意见是，研究者应泛读和精读相结合，而不是零摘碎取，须多方对比使用。但畜产调查资料的可靠性要高些，主要原因是日人摸索出一套实地踏查与地域畜群推算的方法，基本避免了漏报或隐瞒。

③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满洲肉类加工业》，《满铁调查资料》第 41 编，日清印刷所，1924 年 9 月，第 19–20 页。

④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畜产班：《察哈尔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1936 年 3 月，第 43 页。

⑤ 满铁总局：《呼伦贝尔畜产调查事情》，1937 年，第 106 页。

⑥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满蒙现状》，1924 年 8 月，第 11–13 页。

表 1 伪满时期东北畜牛数量

年代	1930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1	1943
数量	1605	1358	1296	1401	1683	1735	1782	1859	1262

说明:(1)1930年、1934年数据来源,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畜产资源之工业原料供需关系调查》(《满铁调查报告》第5辑第14册),资料第33编,满洲日报社1931年6月印刷,第6页;(2)1936年、1937年数据,满洲国通讯社所编《满洲国现势》,1939年,第518页;(3)1935、1938-1943数据来源,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畜产》,《东北经济小丛书》(五),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年,第3页。

伪满初期,东北畜牛数量较前持续下降。表1中,1936年畜牛数量较1930年减少了12.71%。主要是由于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各国为摆脱危机,纷纷抬高关税,压缩进口,东北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较深,一定程度造成伪满初期农畜产品销路不畅,价格下跌,致使畜产养殖规模衰减。再,畜产税率实行每三只绵羊即抽税一只,其他牲畜均按绵羊折合,牛马折合绵羊七只,骆驼八只,冬羊皮十张折合一只^①,重挫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伪满中期为维持畜产稳定,税率改五抽一,后又降为十五抽一,农户养殖的积极性有所恢复。1937-1941年逐渐恢复,年均增长3%左右,曾一度接近民国初期的水平。但1942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畜牛数量又大幅下降。1943年较前下降了32.1%,较1930年减少了近35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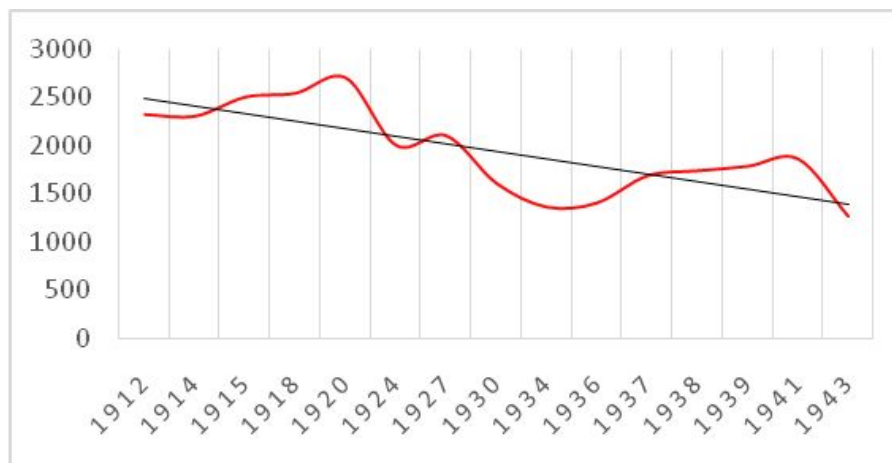


图 1 近代东北畜牛数量曲线图

说明:1912-1920年,依据李群教授《中国近代畜牧业发展研究》校正后数据;1924年数据源自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满蒙现状》;1927年,畜牛数据来源《关于满蒙牛出口日本调查》第327页;1930-1943年数据源自表1。

图1所示,近代东北畜牛数量基本呈负相关态势。1920年前,如考虑到消耗数量及人口因素,此时期畜产规模是较高的。1920年代及伪满洲国时期,畜牛数量较前均大幅下降。其中1930-1936年下降的原因上文已分析。1942年后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东北牛肉成为主要的战略畜产品,供应日本海军。“牛肉出荷”^②直接抑制了畜牛绝对数量的增长。1943年较前大幅下降了32.1%,较1930年减少了近35万头。畜牛资源和其他农畜产品一样,处于崩溃边缘。

① 还振举:《中国的内蒙牧区》,永祥印书馆,1952年,第20页。

② “出荷”为日语表述方式,指“输出”。

二、东北畜牛的流通及屠宰

近代东北畜牛的流通,从日人的调查看 1930 年前有三条通道。第一条北方通道,即满洲里、海拉尔及齐齐哈尔一带,供应群体为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苏联)人,数量 5 万-7 万头。据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1912-1921 年,俄人所设哈尔滨、海拉尔、齐齐哈尔、满洲里等沿线屠宰场,年均屠宰 62174 头,其中 1917 年竟屠宰 114382 头^①。表 2,齐齐哈尔、满洲里及海拉尔畜牛数量达 5.1 万头,加之哈尔滨,俄人是东北内部牛肉消费重要群体,所占比例近三成。

表 2 东北生牛市场可能的存栏数 (万头)

洮南	林西	开鲁	通辽	长春	郑家屯	奉天	铁岭	锦州	齐齐哈尔	满洲里	海拉尔	赤峰	小库伦
1.5	0.5	0.5	1	2	2	2	0.5	1	0.5	1.6	3	3	0.5

说明:通辽区域还包括小库伦,即通辽市奈曼旗库伦镇。赤峰包括乌丹城、经棚即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郑家屯今吉林双辽。

资料来源: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满洲肉类加工业》,《满铁调查资料》第 41 编,1924 年 9 月,第 21-23 页。

第二条天津通道,是东省畜牛和华北耕牛交易的另一中转站。初期关内输入数量不大。1923 年数量达到 1.4 万头。河北政府曾发布耕牛出口禁令。但在日本压力下旋即解除。同时,东北畜牛也有少部分回流华北。赤峰一带的畜牛可直接进入华北,奉天则经锦州进入河北、河南等地,或直接进入天津市场。这部分数量不足一成。

第三条南方通道,洮南、林西、通辽、郑家屯等地畜牛,及长春、铁岭、奉天等满铁沿线城市,有 10 余万头畜牛,大部分就地屠宰、冷藏,然后消费或经大连输往日本。随着俄国爆发革命,尤其 1920 年代中期以后,北方通道逐渐萎缩。东北畜牛资源的输出基本被日人所控制。

东北畜牛包括东省牛(日人称满洲种)、蒙古牛、朝鲜牛,及少量山东牛。东省牛与山东牛分布在辽宁东南部山地及广大农耕地带。蒙古牛分布在内蒙古东部。朝鲜牛集中在吉林延边地区,但由于数量所限,本文暂不作讨论。因此,日人屠宰、输出的畜牛资源多为蒙古牛和东省耕牛。图 1 所列,1930 年东北畜牛 160.5 万头,蒙古牛所占比例为 57%-58%,而东省耕牛比例则略少,如追溯到 1920 年代“移民屯垦”之前,蒙古牛比例可能会更高。

或许有研究者认为,既然每年输出或消费 10 余万头是由市场决定,那么就不会影响畜牛资源。同时,蒙古牛比例高于耕牛,而且只是拽车,不耕犁^②,也就不会影响农耕。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东北畜产市场是典型的殖民地市场,由俄日所控制,所屠宰的畜牛多数为耕牛。

1925-1927 年,大连屠宰场共屠宰畜牛 47257 头,其中耕牛所占比例为 97%,蒙古牛仅占 0.5%^③,其他屠宰场基本类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脂肪密致及沉积看,山东牛 5.85%,东省耕牛及蒙古牛脂肪仅附属于表面,且肉质不显大理石形状,肉味不美^④。从出肉率看,山东牛 50%,东省耕牛 48%-52%,而蒙古牛 42%-45%。从牛肉色泽看,山东牛和东省牛均属“带赫赤色”,而蒙古牛则为“暗赫赤色”。从

① 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中东铁路沿线的畜产》,大连小林又七支店,1930 年 6 月印刷,第 9-10 页。

② 13 世纪徐霆出使蒙古时,草原上纯是黄牛,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见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 页。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并未改变。

③ 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关于满蒙牛出口日本调查》(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资料第 24 编),满洲日报社,1930 年 2 月,第 140 页。

④ 黄越川:《东三省畜产志》,开明书店,1940 年,第 35-36 页。

香气角度看,山东牛富有香气,蒙古牛一般,东省牛则缺乏香气^①。从牛肉食用指标看,山东牛明显优于东省牛、蒙古牛,而东省牛和蒙古牛在肉质上似乎都较差。但从屠宰的经济成本看,东省牛则优于蒙古牛。第一,蒙古牛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昭乌达、哲里木及呼伦贝尔,地处草原深处,距离铁路较远,即使最近的白音太来、郑家屯等家畜交易市场,如骑马驱畜,有三至五天的路程,而耕牛则分布在农耕地带及城市间,与日人所设屠宰场相近,屠宰便利且成本较低。第二,蒙古牛地处寒冷风大地带,逐水草而常年放牧,没有棚圈,管理粗放,虽有较强的耐寒及抗病力,但也造成其体型小且矮,晚熟且产肉少,屠宰的经济性低于耕牛。据现代黄牛学研究,延边成年公牛体重可达 625 千克,母牛 425 千克,辽东半岛复州公牛 911.2 千克,母牛 469 千克,而蒙古公牛仅 349 千克,母牛 291 千克^②。甚至可以说,蒙古牛,是北方黄牛中体型最矮小的。显然,屠宰体型大的耕牛更具有经济效益。

令人疑惑的是,东省牛与山东牛均属华北役用型^③,有着相似的饲养方式,肉质理应相同。据调查,东省畜牛夏季饲料以青草为主,农耕期间加喂高粱、麸皮、豆粕等,分早晚各一次,冬季干草、粟秆等,役用则加喂精饲料,其余时间则散养于外^④。这与《王祯农书》畜养篇第十四关于牛的饲养基本类似^⑤。笔者初步分析,东北天气严寒,冬季漫长且牛舍简陋,保暖性差,农户管理不善是主要原因。

由于东省牛肉质不及山东牛、朝鲜牛,尤其是筋肉不结实,不合日人口味,因此,在输出过程中多以冷冻块肉或罐头为主^⑥。这样,屠宰就成为生牛输出的重要环节。据满铁临时经济委员会调查,辽吉屠宰场共 41 处。据统计,屠宰场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关东州所属,旅顺、大连、柳树屯、水师营、金州、三十里堡、普兰店和貔子窝八处。第二类所谓满铁附属地所属,瓦房店、熊岳城、松树、辽阳、奉天、抚顺、本溪湖、公主岭、长春等,以上九处为满铁所有,其余海城、南台、鞍山、铁岭、双庙子、开原、昌图、四平街、范家屯等九处是日人私营。第三类中日合办安东屠宰场,1927 年屠宰量 5864 头,该年度仅次于大连屠宰场,由朝鲜日本军队和总督府所消耗。第四类满铁附属地外屠宰场,营口、郭家店等两处,表面在中国辖区,但实际仍由日人控制。第五类中国方面所设,主要分布在郑家屯、长春、瓦房店、宽城子、吉林、铁岭、辽阳、营口、洮南、奉天、海城、公主岭等地,以上十二处所屠牛肉依然供应日人。1925 年,在上述四十一个屠宰点共屠宰 99175 头,1926 年 79762 头,每年平均宰杀 89467 头。其中大连、奉天、开原、铁岭等地日人所控屠宰场,设施先进,近代化程度较高,均有高架轨道装置,可使畜体自动悬垂移动,畜体垂直卷扬机若干,有检疫室、牛马屠宰室、羊猪屠宰室、病畜隔离所等,还有内脏检查室、煮沸室、消毒室、汽罐室、预备机关室、浸汤室等,分工明确,日屠宰量百头以上。其中大连屠宰场年屠宰量 1.2—2 万头,在 41 屠宰场中占 14.3%—21.9%^⑦。主要原因,日人长期推行所谓“大连中心主义”,该市近代化的关联设施较齐全。其次,大连是东北货物输出的主要港口。1920 年代,该港对外贸易额占东北 67%—70%,与上海并称中国南北两大良港,国际地位极为重要^⑧。第三,大连是一个国际化城市,除

①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满洲肉类加工业》,第 30、39 页。

② 徐尚忠、高雪主编:《中国黄牛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第 61、66、69 页。

③ 张仲葛、黄惟一编著:《祖国的畜牧与畜产资源》(1953)提出,黄牛有三种类型,产在兴安岭东西两侧、内蒙、察哈尔、绥远、甘青,属于蒙古牛。产在辽吉南部,东部山地及辽东半岛,河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属于华北役用型。第三类是华南黄牛。徐尚忠、高雪主编《中国黄牛学》(2013)则用北方黄牛、中原黄牛和南方黄牛概括。二者的划分是一致的。从黄牛学角度看,东北牛和山东牛肩胛均有肉峰,属同一种类应是无疑的。

④ 满铁调查部畜产班:《兴安西省及热河管内役畜资源现状调查》(1939 年 6 月),《满铁调查报告》第 2 辑第 7 册,第 68—69 页。

⑤ [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04—105 页。

⑥ 日本工业化学会满洲支部编,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0 页。

⑦ 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关于满蒙牛出口日本调查》,第 21—22、138—140 页。

⑧ 顾明义、张德良:《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59 页。

日本人外,还有苏联、英国、德国、美国、希腊、波兰、丹麦等国侨民,外国人所占比例在 25%以上,畜牛就近屠宰,一则满足了当地市场的需求,二则在输出过程中减少了中间冷冻、运输等环节,降低了牛肉的输出成本。

三、牛肉资源的消耗及供应日本军队

1930 年后日本海军成为东北牛肉资源的主要需求者。在此之前该海军主要依赖我国关内牛肉。青岛是关内畜牛的主要集散地。据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调查,1920-1927 年,该地集中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 490195 万头牛,其中屠宰后供应该国海军 431956 头,占总数 88.1%。年供应量 53995 头^①。但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及“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关内供应逐渐减弱。日人遂决定以“满蒙牛肉”供应其海军^②。再,“满蒙牛肉”价格低廉,输出便利。据调查,1920 年代东省牛肉价格仅是日本本土的 20%,有时甚至跌至 10%,如此大大降低供应成本。在此期间,东亚劝业会社及稍后成立的满洲畜产工业会社是该海军牛肉的供应商。

东亚劝业会社成立于 1922 年,总部设在奉天,长期从事农畜牧业、牛肉屠宰,牧场以通辽和林西为中心,屠宰场在铁岭。1929 年,向东京和桦太(库页岛南部)输出活牛 1700 头,同时还向东京、大阪和神户发送牛肉和装箱肉 500 头,并计划以后每月向东京运送 2-3 次,桦太每年 2-3 次^③。1930 年代日本海军人数 12.7 万-19.1 万,年消耗牛肉 300 万公斤。在东京畜产会的斡旋下,东亚劝业会社取得该海军的信任,开始为其提供牛肉。1932 年,向日本海军提供 50.09 万公斤,占其牛肉输出量的 42.6%。到了 1935 年输出量 1920 头,比重达到了 82%^④。但绝对量显然满足不了该海军的需求。日本海军军需部门提出,东亚劝业须将牛肉输出整合为独立企业,扩大铁岭屠宰场和奉天屠宰场的规模,毋须为民间提供牛肉,专门服务于日本海军,每年规模要超过 1.2 万头^⑤。需要说明的是,东亚劝业主要从事土地买卖及日本移民,牛肉输出只是附带业务。1936 年,该会社解散后将“满蒙牛加工输出业”并入“满洲畜产工业会社”。

1937 年 9 月,“满洲畜产会社”在奉天成立,职能是强化对畜产及畜产品加工的统制,整合东北畜产资源,与“北边振兴”、“开拓政策”相适应,是伪满重要的“国策会社”。“满洲畜产工业”随即并入该会社。对于牛肉业务,提出第一向日本海军供应 6 千头,五年内每年增加 1 千头,第六年后保持 1 万头的规模。1937 年,该会社对海军供应东省牛肉 103 万公斤。东省 1 头成年牛产肉 160 公斤,即屠宰 6437 头,超过了原计划。

关东军消耗牛肉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仅 1 万人,而到卢沟桥事变时已增加到 20 万。为扩大牛肉的供应源,在“满洲畜产会社”的操纵下,日伪成立了畜牛饲养合作社,提出中长期内将畜牛由 198 万头增加到 274 万头,短期内则在华北和东北设立收购店,加速掠夺畜牛资源。第一,以奉天为中心的收购点,奉天东部和吉林山区的东省耕牛,以及经棚、林东、林西、乌丹城、赤峰、朝阳等地蒙古牛;第二,以大连为中心,辽东半岛复县牛、关东州内产牛,及从山东龙口移入的山东牛;

① 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关于满蒙牛出口日本调查》,第 247、262 页。

② 苏崇民:《农林牧业扩张与移民》,《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第 9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91 页。

③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工业班:《满洲牛肉输出事业方策》,《立案调查书》第 10 编第 2 卷,1934 年 10 月,第 197-198 页。

④ 东亚劝业会社《1932 年度事业实绩》,1936 年 6 月 11 日《东亚劝业会社第十四期监查报告》,《满铁与移民(分卷一)》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27、第 471 页。

⑤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工业班:《满洲牛肉输出事业方策》,1934 年 10 月,第 6-8 页。

第三,以天津为中心,从内蒙乌兰布旗、多伦赶往张家口、热河及冀东一带的牛,山西、河北所谓的“天津牛”。收购办法是在奉天、天津、大连等地广设牛店及依托当地牛贩子^①。为保证畜牛收购,还为距离铁路较远的牧户和牛店提供便利,设立家畜市场,实行快速收购。

1938年,伪满牛肉产量21958吨,1939年22728吨^②。即平均每年屠宰畜牛13.94万头。如以1925和1926年均屠宰量89467头为基准,十多年后在畜牛资源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屠宰量却提高了56.1%。1941年,德国闪击苏联。6月26日,关东军参谋长吉本贞一提出,随着苏德开战,关东军应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即“关特演”,对苏积极备战。7月7日及16日,日本陆军先后两次下达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动员令,并多次向东北增兵。1942年关东军总兵力达到70余万。为了配合关东军军事行动,“满洲畜产工业”为其供应牛肉。1941年供应1.5千吨,第二年度增加一倍,第四年度再增加一倍,达到6千吨,如用头数计,将达到3.75万头。

但随着德军迅速击败苏联战略的破产,日军被迫搁置“北进战略”,转而实施“南下政策”。日本海军规模遂呈几何数字增长。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海军人数32.2万,较十年前增加了两倍有余。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该海军海外投降40.3万,死亡及失踪42.8万^③,合计83.1万人,较1941年又增加2.6倍。如牛肉的供应同步,则需6千至1万吨,合生牛3万-5万头。此时期日本本土畜牛资源几近枯竭,东北、华北便成为牛肉的主要供应源。综合以上,此时期日人牛肉消耗至少3万吨,如以头数计,则需18万-20万头。

四、日人超量掠取对东北畜牛资源的影响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满铁为基础,对东北的农畜资源进行垄断性投资,试图与其形成“经济一体化”。畜牛是主要的“战略畜产资源”,尤其是伪满时期,东北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随着日人对外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牛肉出荷”,与“粮谷出荷”一样,其掠取的规模也进一步提升。这种掠夺式的消耗和输出,严重影响东北畜牛资源的自然增殖。

民国时期,东北畜牛因肉质原因,日人侧重屠宰后以罐头及冷藏块肉的形式输往日本。伪满时期,东北牛肉的战略地位完全凸显,除日本市场及伪满各地官僚系统外,重点供应日本海军和关东军。其屠宰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关于屠宰量与畜牛总量的合理关系,日人经调查和推算认为较合理的屠宰率是6.44%^④。如超过此比率,可能会影响到种群的发展。1924年苏联人及日人合计屠宰13万-15万,比率达6.5%-7.5%,结合还振举、伊东靖诚对损耗率的推估,死亡率和出卖率9%-11%,即推算出该时期东北畜牛损耗率在15%-19%区间。再以出生率与损耗率差额推算,此时期畜牛增值率1.5%-4.5%,虽低于4%-8%的预期,但畜牛的自然增值却是有保障的。伪满时期,由于屠宰规模的加剧,该比率急剧抬升。结合图1所列数据,1934-1943年,畜牛平均数量154.7万头,较前下降近50万头,但日人屠宰量依然维持在较高规模,数量在18万-20万头,屠宰率11.6%-12.9%,加之死亡率和出卖率9%-11%,伪满时期畜牛的消耗率20.6%-23.9%。以出生率与损耗率差额推算,此时期畜牛增值率-3.9%至-0.6%。畜牛的自然增值则无从谈起,东北畜牛的种群安全也无法保障,牛荒迅速蔓延,尤其是耕牛

① 苏崇民主编:《工商矿业统制与掠夺》,《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第1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9-100页。

② [日]“满史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内部发行,1988年,第532页。

③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全四册),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55、1782、1799页。

④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畜产资源之工业原料供需关系调查》,资料第33编,满洲日报社,1931年6月印刷,第30页。

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农耕。

如前所述,日本输出的畜牛以耕牛为主,非牧区畜牛。东北农耕地畜牛,以役畜为主,养牛多为副业,每家所畜不过一二头,专业养殖很少。1920年前,每年一两万头的输出可能影响不了农耕。但1920年代,屠宰及输出数量超过十万头,东北农耕大受影响。铁犁牛耕是我国传统农耕方式。“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劝农爱牛,禁宰耕牛,并订入立法^①,只有老而无用的牛才屠宰。近代以后由于规模化屠宰,牛日益稀缺,耕作时甚至几户农民通过搭套的方式合作^②。1927年,中华民国实业部不仅禁止畜牛出口,而且曾电令各省严禁屠宰耕牛。实业部提出,耕牛关系农耕大事,电令各省设法收容耕牛,并提请青岛及上海提供血清预防牛疫^③,确保耕牛健康及农耕切实进行。1931年9月21日,东北政委会《咨请财政部禁止吉江省生牛及牛肉出口一案》,财政部回复,“查吉江两省耕牛产额近年见减少,为免除妨害农耕起见,自当禁止出口,至冷制牛肉一项,对于外商营业即未核准,有案且即系宰杀生牛而来,拟应一并查禁。”^④直至“九·一八”发生后不久,东北官方仍在呼吁禁止屠宰、输出耕牛。

伪满时期,日人超负荷屠宰,牛荒进一步加剧。在日本投降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多次发布保护耕牛的通令,但牛荒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1947年1月2日,该委员会发布《保护耕畜的通令》,“为开展生产运动,解决处理困难,保护耕畜,特规定:严禁屠宰耕畜,凡年老或残废牲畜不能使用耕作者,须经区级以上政府批准,始准宰杀。”^⑤翌年3月8日,又发布《保护耕畜令》,严禁屠宰耕畜。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甚至提出,饲养种畜有成绩的农户,政府予以奖励;种畜不足地区,政府予以解决;要求牧区禁止役用种畜。在饲养管理方面,要求秋季割草囤草,修葺厩棚,使耕畜顺利度过严寒。禁止宰杀及在蒙民和汉民中征收家畜、家畜皮。尽管东北行政委员会采取诸多措施,如科学饲养、奖励保种、禁止屠宰等,但东北即使解放后很长时间,耕牛紧缺未获实质性解决。毫无疑问,这是“历史欠账”,是日人超负荷消耗和输出所造成的。

[参 考 文 献]

- [1] 陈 锋.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J]. 近代史研究, 2004, (3).
- [2] 李 群. 中国近代畜牧业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4.
- [3] 徐尚忠, 高雪. 中国黄牛学[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
- [4] 王建革.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① 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 农业出版社, 1985年, 第46—48页。

②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三联书店, 2009年, 第167页。

③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810), 《实业公报》(38至42), 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 《实业公报·公牍》, 第38期, 第12页。

④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810), 《实业公报》(38至42), 第38期, 第6页。

⑤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444、488—489页。